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◎主编

飞逸的思绪

FEIYIDESIXU

任何的限制，
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的。

一个能从别人的观念来看事情，
能了解别人心灵活动的人永远不
必为自己的前途担心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飞逸的思絮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数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1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文明的华夏,名人辈出,代代相续,千古人物。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,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,谁不希望成功?谁不想到成名?谁不企盼成家?21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:“成功从何处起步?成名的奥秘在哪里?成家的诀窍是什么?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?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,怀着眷眷深情,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,溯流而上,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,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,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,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,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,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,了解名人过去了的的历史,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,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,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,他们的青春岁月,充满了苦辣酸辛,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,或历曲折的境遇,或扬逆水的风帆,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幸福的回忆,更有苦涩的泪水;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挫折的苦闷,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,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,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,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,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,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;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,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,若汩汩清泉,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,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,做人的道理,处世的艺术,成名成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,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,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,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,肩负重任,迎着风雨,用坚强的信念,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,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,走向未来,走向光明,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成功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他,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目 录

第一章 书话书海泛舟	1
一 闲适与启蒙	2
二 解说人生	9
三 思想与智慧	17
四 消遣与审美	23
五 心灵的感知	30
第二章 随笔炉边漫语	40
一 飞逸的思絮	43
二 谈禅说道	54
三 圆熟的智慧	61
四 冷眼与智慧	71
五 浪漫的畅想	81
六 退守与超逸	86
第三章 忆旧散文上映“记忆”	100
一 朝花夕拾	101
二 背影难忘	108

三 血泪与慰藉	112
四 磨砺与成熟	119
五 理性与反思	124
六 情缘回想	137
 第四章 纪游散文大地上的行吟	 157
一 苦难与光明	160
二 归位与吟哦	173

第一章

书话书海泛舟

人与这个世界的交接有多种方式：直接与大自然对话是一种；与朋友、家人在炉边闲谈是一种；直接关注和批评现实是一种；回味自己的过去是一种；用心灵在诗意中穿行是一种……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，那就是在“书”中生活。

书，大不盈尺，小不盈握，它只是用纸片等装订成册，内含着文字而已，然而，它却与人类有着不可或缺的关联。从历史上看，书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。结束了结绳记事时代，进入了新的文明时期；从现实来看，书是人类交流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，离开了书，人类生活几乎是不可想像的。更有甚者，一些专家学者、文人雅士将其一生都埋在书里，他们是通过“书”与历史与世界沟通的。还有一类更特殊的人，他们耽于书内，视书如命，乐在书中：奇书珍本令其迷狂，书籍装帧令其陶醉，书内的思想令其满足。于是，寻书、藏书、读书、写书成为他们人生的第一要义。

对许多爱书者而言，他们可能就止于寻、藏、读、赏、玩而已，即使有领悟有心得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流水悄然而逝。还有一些爱书者，他们将自己与书的关联、感悟、思想和希望真实地

诉诸文字,这种“谈”书的作品就成了“书话”。顾名思义,“书话”就是“话”书的,只要自己对“书”有感,有独到的见解,并用富有个性化的文学笔法将它真实地表现出来,都可称之为书话。

与其他散文样式一样,20世纪中国书话获得了较大发展,一些有特色的书话家也纷纷涌现出来。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、政治、思想、文化等的独特性,书话也就与中国传统与外国书话有了明显的区别,带有自己鲜明的特色。

一 闲适与启蒙

周作人曾承认自身的矛盾性:一面是“叛徒”,一面是“隐士”。大致说来,在周作人文化杂感中表现出与长兄鲁迅一样的“叛逆”精神及其锋芒,即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礼教进行彻底的批判。但另一面,在周作人美文和书话中,却表现出明显的“隐逸”意识和情调,尤其在书话中更是如此。

一般说来,“书语”是周作人向传统回归、走进历史的一个通道;“书话”是周作人放弃战斗走向闲适的一种方式;“书语”是周作人远离中心来到边缘的一种途径,这一观点大概不会有人提出疑义。因为在周作人的书话中,不论是思想还是格调都相当程度地失去了五四时代的激烈奋发、昂扬向上。比如,1925年,在《古书可读否的问题》里,周作人与“主张不读古书,应将古书扔进茅厕”的观点不同,而是提出这样的观点:“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,只要读的人是‘通’的。”显然,这与彻底的反对

传统文化的五四精神是不相容的。

但是,我们并不能因此简单说,周作人书话是“保守”的,完全“闲适的”,是与20世纪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,甚至是背道而驰的。事实上,在与时代、社会、政治等拉开相当的距离,在从容、闲适与平淡的格调中,周作人书话仍表现出较强的“馆蒙意识”,表现出更为内在的现代文化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。换言之,周作人书话放弃的是杂感的峻急和粗率,而启蒙精神仍然保存和贯穿在作品之中。

早在1914年,周作人就在《读书论》中指出“恶书”、“庸劣之书”为天下公害,“若田有蔓草,夺良苗之膏泽而阻其长”,“非特无用,且为大害”。进而,作者对书业的不良风气批评说:“文人书估,朋比为奸,以欺世人。更有进者,佣书卖文之徒。不知醇美趣味与时代文明,俨为文苑领袖,教世人以趋时,使读最新之书,以为社交谈助。”这显然有五四时代的启蒙精神:强烈、峻急、率直的社会文明批判。

五四过后,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我们仍可看到周作人书话里的直接启蒙精神,尽管时代色彩和社会政治意识有所淡化。在《儿童的书》和《关于儿童的书》里,周作人对中国没有儿童书表示忧虑:“二十馀年后的今日,教育文艺比那时发达多了,但这个要求曾否满足,有多少适宜的儿童的书了么?”没有儿童要读的书,大家都不关心儿童的发展,那我们的教育,我们国家的富强,都将成为一句空话。最可怕的是,在儿童歌谣故事书里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,一是太教育的,即偏于教训;一是太艺术的,即偏于玄美,而前者流毒尤甚。周作人坚决反对在儿

童、小学生书刊上开辟“提倡国货号”，“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”。对许多小学生参加“示威运动”，周作人非常愤怒：“我看了不禁伤心，想到那些主任教员真可以当得‘贼夫人之子’的评语。小孩长大后，因了自主的判断，要去冒险舍生，别人没有什么话说，但是这样的糟蹋，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了。”周作人并不否认艺术里可以寓意，但他强调：“须得如做果汁冰酪一样，要把果子味混透在酪里，决不可只把一块果子皮放在上面就算了事。”当然，周作人指出，即使是这样的水乳交融，那也不是儿童文学的最上乘，“因为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有那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”。像安徒生的《丑小鸭》是佳作，但《小伊达的花》则更佳。为什么呢？作者认为：“实在只因他那非教训的无意思，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，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了。”如何让孩子在纯洁的自然天地里自由成长，保存他们的幻想、天真和本性，而不受现实社会黑暗及道学文化的污染，这是儿童书籍应该注意的。所以，作者提出这样的观念：“让他们愉快的活动，这便是最大的实益。”“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，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。”

20世纪30年代后周作人书话文体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：大段大段的引录别人的话，有时整个作品就是一篇摘录。周作人戏称自己为“文抄公”。对于这种文体，学界多持否定性意见，认为是失败的，标志着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倒退；也有人认为，周作人抄书散文是古今未有的创体^①，有人甚至认为“抄书体散文代表着知堂小品散文文体创造的最高成就”。^②完全无视周作人“抄书体”的价值意义显然是不对的，但将这一文体抬得过高，

似也值得商榷。以往,研究者多站在小品散文角度看周作人的“抄书体”,这就难免有这样的偏误:忽略了其“书语”的文体特征。

如果从“美文”(或称小品文)角度看,周作人“抄书”散文当然水平不高,它甚至不能称为精致、性灵的小品,虽抄书也需要个性与品位,但纯粹抄录必然限制作者“个性”、“灵性”和“笔调”的充分发挥。事实上,周作人“抄书体”散文更贴近书话体,如果从此角度看,这一文体无疑是具有独创性,其成就、价值和意义不可否认。因为书话即是“话”书的,那么,它就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,当然周作人“抄书体”也就是书话方式的一种。

周作人自己承认他的“抄书体”散文的价值意义,他说:“人家不理解,于别人不能有什么好处,虽然我十分承认,且以为当然,然而在同时也相信这仍是值得写,因为我终于只是一个读书人,读书所得就只这一点,如不写下来,未免可惜。”(《读书的经验》)以“读书人”为立足点,写下自己“所得”,那当然有价值。在我看来,周作人的“抄书体”书话至少包含着丰富的知识:古今中外、正史野史、杂说笔记、神话学、民俗学、生物学、性心理学、历史学、文学等几乎无所不包。周作人曾赋读书诗一首,曰:世有好事人,扣门乞传授。舌存不可惜,对客徒搔首。非不愿借,乃无可借者。此事无捷径,唯苦读之,良久,自知其味。走进周作人“抄书体”书话里,读者就如同走进无所不包的杂货铺,真有琳琅满目之感!如果想得到个性、灵性和韵致,当然不如到其“美文”中寻找。若要领略沧海之富,世界之奇,那么这里应有尽有,俯拾即是。

当然,周作人“抄书体”书话并不是无思想的杂货堆积,其中不乏作者现代启蒙意识及其观念。首先,抄录本身就需要眼光和选择。周作人说“没有意见怎么抄法”?我们从周作人书话中可见,许多抄录都寓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和审美选择。如在《关于尺牍》中,作者抄录李卓吾尺牍后说:“若后半则无一语不妙,不佞亦深有同意,盖有许多人都与我们同一。”“李卓老天下快人,破口说出,此古今大官们乃一时失色,此真可谓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尺牍也。”这里,作者以尺牍的自然天真、率性而为来反对道学八股文章,确实点到了要害,既对古,又对今,有一石双鸟之妙!如果没有对生命意识的深刻理解恐怕难以做到。又如在《猫头鹰》里用大量事实证明说,猫头鹰不仅不恶,更不会食母,它巢里的毛骨并不是自己母亲的,而是别的小动物的。周作人最后说:“中国学者如此格物,何能致知,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盖自有其所以然也。”与此相关,周作人还对龟蛇交尾、腐草化萤等中国民间传说提出质疑,认为这都没有科学根据。可以说,周作人虽是杂家,“抄书体”书话中知识丰富,但显然不是随意抄录,而是以科学、民主、平等、自由等现代启蒙思想为依据。用现代文化思想来读书、启蒙,当然不会成为书虫,而是目的明确。

周作人“抄书体”书话还有一个特长就是从生活出发,喜爱搜集记载有关“草木虫鱼”等细琐小物的书籍,其目的是“格物致知”,达到现代文化启蒙的目的。我们知道,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往往多谈救国、主义、问题等形而上的大问题,而少谈繁琐细物的小事,这当然与国家民族贫穷落后有关,与中国人欲富

国强民的忧患意识有关,但这一倾向的最大弊端就是社会风气越来越空浮,形式主义日益猖獗,而离自然离天地之道越来越远。而周作人则不同,他认为要“格物致知”必须从最微细的自然现象入手。如在《百廿虫吟》里周作人说:“我们观察生物的生活,拿来与人生比勘,有几分与生物相同,是必要健全的,有几分能够超出一点,有几分却是堕落到禽兽以下去了;这样的时常想想,实在是比讲道学还要切实的修身工夫,是有新的道德的有意义的事。”人有理智,固然比动植物、生物高明了,但有时反而不如它们自然,反而“利用理智来无理的掩饰,此乃是禽兽所不为的勾当,例如烧死异端说是救他的灵魂,占去满洲说是行王道之类是也。”这种以“物”观“人”方法是周作人“抄书体”书话中常用的方法,这也是一种启蒙方式。

周作人“抄书体”书话的意义还在于“还原”,即尽量将自己主观性隐藏起来,让读者现身说法。周作人认为,有的书道理说得已经很明白,自己再去说很可能会得“言”失“义”,买椟还珠,不如将原文抄录下来,优劣高下让读者自己去判定,去欣赏。这确实是一种独创的书话文体,给读者更大的自由阅读、想像和创造空间。可以说,周作人通过“抄书”这座桥梁让读者直接参与其中,而不是置身“书语”之外一味跟在书话家的思想后面奔跑。换言之,周作人“抄书体”书话创造了一个有较大弹性和张力的可能性时空“场”,读者可以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,在这个“场”中自由遨游。从此意义上说,周作人“抄书体”书话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,它避免个人对“书”的过分解释和越俎代庖,也避免另一种“话语霸权”,因为一己之见总是一孔之见,难

免偏颇。

周作人“抄书体”确是一种特殊的书话文体，它表面“闲适”，似不多发表意见，但这并不等于作者沉默不言，更不能说作者放弃了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，只是“说话”的方式有所变化而已。周作人曾不满于林语堂对他的批评，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说：“语堂系是旧友，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。他说后来专抄古书，不发表意见，此与说我是‘文抄公’者正是一样的看法。”^③在周作人看来，“抄书”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表达，它离不开思想。从此意义上说，对周作人的“抄书体”，林语堂未能理解其精神主旨，即现代思想和文化启蒙意识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因此说，“抄书体”书话代表了周作人书话的最高成就，倘如此，岂不是好的“抄书”就是精美的书话了？我认为，周作人的“抄书体”书话确是一种创造，具有很强的知识性、思想性和现代性，但是，由于作者过分沉溺“知识史料”，过于隐蔽“自己”的声音，从而限制了思想的进一步开拓，更忽略了创造性的融汇贯通，当然作品连绵一体的文气也受到损伤。叔本华曾谈到“读书”和“思想”的关系时说：“在读书时，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。所以，读书愈多，或整天沉浸于读书的人，虽然可借以休养精神，但他的思维能力必将渐次丧失。”^④周作人“抄书体”书话虽没有丧失思维能力，且能将他人思想纳入自己的思想系统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，但是，过于依赖和使用他人的材料，不能将之打碎、重组，并化为自己的思想血肉，使文章浑然一体，气脉贯通，这也是周作人“抄书体”书话存在的明显局限。从此意义上说，林语堂批评周作人是

“专抄古书,不发表意见”又不是没有道理的了。因为林语堂是非常注重读书的思想性的,在《读书的艺术》中他说:“真正有益的读书,便是能引领我们进入到这个沉思境界的读书。”

总之,对比那些积极进取、具有反叛精神的杂感,周作人的书话确实显得闲适从容,远离了时代潮头。此时,周作人乐读闲书杂书,偏爱抄书笔录,沉溺于书斋生活,写着他“无关宏旨”的书话,这里充分表现了周作人超脱和自由的心态。但是,周作人的书话并不是象牙塔中的“玩艺儿”,而是内含着现代的启蒙精神,即使那些“抄书体”书话也是这样。周作人的书话看似“超脱”,实则“执著”,在那平淡宁静中有包裹不住的无奈和忧患,以及对国家民族文化精神的忧思。

二 解说人生

如果说周作人书话总有五四启蒙者的影子在,总内含着科学、民主、自由的文化启蒙精神,而“书”往往只是一个连接着“我”与“启蒙”的“中介物”,那么,叶灵凤、郑振铎和阿英的书话则淡化了启蒙精神,偏于从“人生”角度来寻书、藏书、爱书、读书和谈书。“书”在这里被重视起来,与书话家的关系更近了一步,感情也更真挚了。

叶灵凤,是20世纪中国作家中少有的藏书家、爱书家和书话家。据说,早年他在上海的万卷藏书都毁于抗日战争的炮火之中,到香港后他又继续买书、藏书,其数目也相当可观,不下于早期藏书。叶灵凤多次谈到自己是“爱书家”,对那些购书而



不读书,藏书而不爱书的人,他不屑一谈。叶灵凤还是一个书话家,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他的《读书随笔》,1970年上海书局出版了他的《北窗读书录》,1988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他的三卷本《读书随笔》。

叶灵凤与周作人的书话一样,也有着丰富的知识性。只是周作人偏于中国古代和日本文化文学书籍的介绍,而叶灵凤则偏于西方文学艺术书籍的介绍。在叶灵凤书话中仿佛是关于西方作家、艺术家的画廊,徜徉其中真是大饱眼福,细细品味则满口余香。这里有传记、短篇小说、悲剧、寓言、故事集、喜剧、童话、散文集、回忆录、谈话录、日记、旅行记、美术图录、情书、翻版书、藏书票等等,这里有但丁、普洛斯特、斯蒂芬逊、法朗士、爱伦·坡、劳伦斯、歌德、屠格涅夫、左拉、纪德、乔治摩亚、叔本华、莎士比亚、乔伊斯、乔叟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彭斯、席勒、达尔文、赫胥黎、王尔德、小仲马、卡夫卡、海明威、雨果、罗曼·罗兰、培根、狄福、里尔克等等。对那些不太熟悉的体制和作家作品,读者可通过叶灵凤书话一瞻其风采,而对那些熟悉者,读者